

引子 神秘的老囚之死

1968年“文化大革命”到了第3个年头，中华大地犹如遭受过一场狂飙的肆虐，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一片萧瑟。

这年的3月29日，一个春寒料峭的清晨，首都北京的街头巷尾鲜见行人，光秃秃的树丫在风中瑟瑟发抖，鸟雀们仿佛早已被冻僵了歌喉，了无生气地漠视着这个灰蒙蒙的世界。地处北京郊区的秦城监狱，就这般沉浸在死样的寂静中，让人感到沉重的压力。一位面无表情的看守，嘴巴接连向紧捂着的双手呵着热气，他正在机械地执行着自己百无聊赖的职责。当他冷漠的眼光透过监视孔落在狱中一位老者身上时，只见老者蜷缩在角落那冰冷的水泥地上，像尊放倒的雕塑纹丝不动。

“咳，又死人了！”看守心里想着，但他的表情仍然无动于衷。也难怪，这个疯狂的年头，在他的眼里，死人的事是司空见惯的，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看守按既定程序，慢吞吞吃完饭，在8点多钟打开牢房时，那位老者已死去多时了。

一位法医被看守人员带了进来。6847，法医一眼便望见了死者的囚号。死者是谁，叫什么名字，他无从知道，也毋需知道，他只需要随叫随到地完成任务就可以了。在那个年代，类似这样不明不白的任务是不少的。法医不需多想，便默默地开始了自己的

工作。他看到，犯人身材颀长，衣衫褴褛，枯瘦的双腕上紧箍着冰冷的手铐。尽管由于长时间没有修面，头发杂乱，胡子拉碴，但仍能看出，这个人的眉目很清秀。

由于尸身僵硬，法医费了好大一番工夫才为死者除去冰冷的手铐。他吃惊地发现，死者的双腕和两肘已经被磨去了皮肤，血肉模糊成一片。他再检查死者的腹部，凭他的经验，可以判断出死者已经几天没有进食了；死者浑身上下，尽是青紫色……法医断定，这完全是受饿受冻受折磨而死的。

这是何许人？如此大的年纪，竟然遭受这样非人的折磨，天理何在！医生的良知使他义愤填膺。但是，面对着看守那冷漠的神情、凶神恶煞般的目光，他知道结论早就已经定好了，他只是来例行公事而已。于是，他抖颤着双手，从看守手中接过笔，在死因鉴定书上写上：“根据情况介绍，符合病死。”这是一份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一份特殊鉴定书。

就在这位“政治犯”去世的当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的邱会作，却满脸谄笑，给毛家湾的女主人——叶群打去了长长的热线电话，邀功请赏。闻听这位犯人去世的“好消息”，叶群抑止不住内心的喜悦，恶语喋喋：死了就好，早死一天，“101”早安心一天！红得发紫的林“副统帅”平时那难得一笑的瘦脸，竟也露出了一丝冷峻的笑意：他的一桩心事总算了却了。

这位犯人的死，为什么令当时正红得发紫的林“副统帅”如此关注呢？这个人到底是谁呢？让我们走向历史的时空，慢慢来解开这个硕大的谜吧！

1. 基督徒的赤化

基督院长眼中的共产党员群像

这位让林“副统帅”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肉中刺的“老囚”就是曾任过福建汀州福音医院院长的傅连璋。

说起汀州府的福音医院，知道些历史的人们大概有些印象。它是晚清时期英国教会开办的，规模不算大，设备也不太齐全。可在当时来说，这个地处山乡小县城的医院，却已经是方圆几百里内数一数二的大医院。出身寒微的傅连璋，为什么会成为这座闻名遐迩的福音医院的院长，却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斑斓传奇。

那是 1925 年，全国掀起了风起云涌的“五卅”爱国运动，其浪潮也激荡着地处闽西山区的长汀县城。群众纷纷举行示威游行，反对英、日帝国主义侵略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山城。在爱国运动的洗礼下，福音医院医生傅连璋激于民族义愤，毅然签名通电全国，反对英、日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在声势浩大的反帝声浪中，外国人感到大势已去，福音医院的洋院长和洋医生们也纷纷离开。就这样，善良正直、医术精湛而且人缘极好的傅连璋被

公推为福音医院的院长，代替英国人主持医院的全面工作。这年，傅连璋才 31 岁。

英国人虽然走了，福音医院与外面的联系却没有因此而被隔绝。傅连璋以一位职业医生特有的敏感，关注着“病中”中国形势的发展。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然而人们的喜悦还没有维持多久，蒋介石却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一时间，白色恐怖的阴霾笼罩华夏大地。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挽救革命，奋起反抗，树起了自己鲜艳的旗帜，发动了著名的南昌起义。

傅连璋从报纸上获悉南昌起义的消息，并且从当地党的地下组织人员口中知道了起义的原因。他特别关心这次起义的进展。后来得知起义军退出了南昌，正向南而来，后面还有国民党钱大钧部的追击。眼看一场恶仗在所难免，出于对国民党蒋介石背信弃义屠戮革命盟友的憎恶，傅连璋深为这支革命武装的命运担忧。

傅连璋的举动，受到汀州共产党地方组织的密切关注。

8月中旬的一天，汀州地下党一位负责人秘密拜会傅连璋，亮明自己的身份后，诚恳地说：“傅院长，我党南昌起义的部队已到江西的瑞金和会昌一带，马上还有恶仗要打，到时一定有许多伤病员需要救治。我们考虑到你的情况，所以来找你，希望你能尽全力救治我们的伤病员。”

这位负责人与傅连璋早就认识，双方有较深的交往。傅连璋原先只是把他当成思想比较进步的朋友，而不知道他就是共产党人，并且是一位负责人。现在他找上门来，傅连璋感到是对自己的信任，心里有一股莫名的兴奋，不假思索地表示：“医生当以救死扶伤为天职，我一定尽自己的努力，挽救伤病员的生命。”

这位负责人听出来了，傅连璋的话语中，除了要尽医生的职责外，分明还包含着某种对进步组织的希冀和向往。他兴奋地紧

握着傅连璋的手，道：“好，我在这里先谢谢你了，拜托了！”边说边重重地摇了摇对方的手。这使傅连璋感到肩上责任的分量，郑重地点了点头。

傅连璋 1894 年出生于汀州（今长汀县），父亲傅贵成，母亲官福娣。当他呱呱落地之际，正好是太阳从地平线升起的时刻，所以他的乳名叫太阳生，并以“日新”为名。因家境贫困，为了谋生，傅贵成夫妇由乡下迁到汀州县城，靠当码头搬运工和替人缝洗衣被勉强度日。傅连璋的父母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傅连璋很小就被父母抱着入了教。傅连璋这个名字就是在进教会小学堂时取的，这个日字偏旁的“璋”字，既是“日光上进”之意，也是表示他诞生时正好是太阳升起的时光。傅连璋中学毕业后，进入英国基督教会办的亚盛顿医馆，一面学习，一面为学校放牛、挤奶、做卫生。

1914 年，年满 20 的傅连璋与童养媳刘赐福结婚。母亲和妻子的名字都沾个“福”字，可并没有给这乱世草民之家带来什么福气。就在这年，傅连璋父亲因积劳成疾，撒手西去。为给他治病和办丧事，傅家欠了 300 多元债，债主们天天登门逼债。生活的担子加重了，为了完成学业，傅连璋咬紧牙关，半工半读。次年，他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为了家中生计，他立即受聘为汀属八县的旅行医生，长年跋涉于山谷溪流的荒野之间，历尽了艰辛。

1918 年，傅连璋因出色的医术，升任汀州红十字协会主任医师。1920 年转到亚盛顿医馆任教，并兼福音医院医生和省立七中、女子师范学校的校医。基督教的洗礼，父亲傅贵成的染病身逝，使傅连璋决心以“救死扶伤”为已任，做个称职的好医生。1922 年，傅连璋自费重刻刊印明代洪应明著《菜根谭》300 部，分赠国内藏书楼与图书馆。难能可贵的是，傅连璋在行医期间，还极富同情心和正义感，经常救治贫苦病人，有时不仅不收钱，还经常慷慨

解囊，免费治病、送药，从而获得老百姓的敬重。

“城头变幻大王旗”以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畸形社会现实，使傅连璋不单行医治病，还日益关心起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来。1926年，在一个偶然的时机里，傅连璋在连城结识了国民党左派人士、后来成为闽西共产党领袖的邓子恢。在此前，傅连璋曾阅读过邓子恢创办的《岩声报》，对这份旨在“揭露社会黑暗，报道群众斗争，推广革命思潮，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报纸颇为喜爱。他坦诚地向邓子恢倾谈了自己寻找出路的苦闷。

邓子恢对傅连璋的医术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意味深长地说：“你是个医生，也是个基督徒，但不管怎样，你必须承认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对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就不能不管！治病首先要治国，国不治，则病难除啊！”

邓子恢的这番话，使傅连璋深受教育。治病治病，祖国大病缠身，怎么治呢？他想了想，道：“洋人都骂我们是东亚病夫，我设想医学救国。”

“哦，这与我国作家鲁迅先生最初的想法倒是是一致的。”邓子恢说完，见傅连璋对鲁迅不太熟悉，便告诉他：“鲁迅先生到日本留学时和你一样，是学医的，他希望通过医学救国。但是，一部日本屠杀中国人的电影，使他的医学救国的想法破灭了，他认识到：国不治，就是身体强壮，也免不了被人杀死的命运。于是，他改行写文章，宣传革命真理，号召大家起来推翻吃人的旧社会。”

原来这个叫邓子恢好生敬仰的鲁迅先生竟然也曾经主张医学救国 是呀！国不治，就是成了像华佗孙思邈这样的医仙药圣，能开出成千上万个灵丹妙方，又有何用？

邓子恢见傅连璋迷茫之余又心有所思，不失时机地递上一份自己主办的《岩声报》，指着上面一段话给他念起来：“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狼狈为奸地来扑噬我们，扑噬我们中国，所以

他们是我们的国仇……此仇可以不报吗？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可以不打倒吗？帝国主义一天不打倒，则加在我们身上的锁链一日不得脱落，我们一日得不到真正的自由与平等，所以我们与帝国主义是‘汉贼不两立’。”

听了邓子恢一席话，傅连璋感觉眼前清楚多了。

这次见面时，邓子恢还把瞿秋白的《新社会观》送给傅连璋。这本书收集了瞿秋白著译 23 篇。瞿秋白所写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对傅连璋一生影响很大。他后来曾说：“瞿秋白所著之《新社会观》，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印象，使我懂得革命的人生观，因此更加同情革命，并进而直接参加革命。”

正当傅连璋日益同情革命时，为南昌起义伤员疗伤治病的重任落在了他的肩上。

承诺接受这个重任后，傅连璋立即开始着手布置医院，做好接收伤病员的准备。他清楚，光靠自己这家小医院，要接收一支大部队的伤病员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又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影响，到处奔走，和汀州全城的医生约好，有伤员来时就以福音医院为中心，成立合组医院。他还到自己担任校医的学校，发动教员和学生来帮助做护理工作。此外，他还以博爱和人道的名义，向商人募集了一大笔费用。做了这些准备工作，傅连璋心里才比较安稳了一点。

不久，一位扎着武装带的年轻军官被人带来找到了傅连璋。他自我介绍是南昌起义部队的副官，奉命先行来检查接收伤病员的准备情况。

“早已准备好了。”傅连璋介绍完情况，又带着这位军官在医院内外观看了一遍。年轻军官认真查看了手术室和安置伤员的地方，一个劲点头称好。

8 月下旬，南昌起义军和国民党的部队在江西的壬田和会昌

先后打了两场大仗。很快，起义军的 300 多位伤员被送到汀州来了。傅连璋发动全城的医生和护理人员，先行将伤员安置好，然后分类处理。

在检查伤情时，傅连璋发现，由于会昌离汀州有 90 公里山路，加上气候异常炎热，许多伤员的伤口都感染化脓，伤势严重。

“必须尽快开刀！”经验告诉他时间就是生命，必须尽早采取处理措施。但是，全医院能够动手术的外科医生只有 2 个，2 个人要给 300 多人动手术，还要进行其他治疗，其难度可想而知。

“一定要尽我们的全力，人不够，我也算上。”傅连璋不假思索地说。他学的是内科，外科只懂一些，也比较少用，但在这关键时刻，他顾不得那么多了。

就这样，傅连璋临时凑起了一个 3 人手术小组。

手术一个接一个，紧张得令 3 位医生透不过气来，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只要没有累趴下，就决不下手术台。傅连璋和大家一起，忘记了白天和黑夜，忘记了做过多少个伤员的手术。他只知道，由于自己的努力，许多伤员在与死神和痛苦的抗争中保住了生命，减轻了伤痛。

医院里是紧张的抢救，医院外一派热火朝天。起义军开到汀州，这是百年难遇的大事情，人们都想亲眼目睹这一盛事。傅连璋等人忙得连轴转，根本无暇他顾。他们在病房里就可以听到大街上整齐的脚步声、雄壮的口号声和沸腾的欢呼声，心里虽然痒痒的，谁都想到外面去，哪怕看一眼也好，但他们谁也没有离开伤员半步。

忽然有一天，傅连璋接到一个通知，要他去听报告。他真是喜出望外，大家也都用羡慕的眼光望着他，似乎他是一个最幸运的人，并且嘱咐他尽快回来，把所见所闻讲给大家听。本来傅连璋不想离开伤员，但人们都对他寄托着希望，而且伤员的情况也

基本稳定，所以他还是去了。

一到街上，傅连璋就贪婪地注视着一切不同之处：到处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布告，用石灰水刷在墙上的大幅标语，粘贴在电线杆上的传单，上面写着：“革命者来”、“没收大地主土地”、“耕者有其田”、“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打到东江去，建设根据地”……街角巷口，人们东一群西一伙，在听政工人员演讲。一切的一切，都使傅连璋感到格外新鲜、亲切，身心分外的愉快。

报告会在汀州师范学校的礼堂举行。傅连璋到时礼堂里已经坐了三四百人。台上站着一位戴着眼镜、长相斯文的人，正在富有激情地作报告：“乡亲们，三百年前，我也是汀州人……”后来傅连璋才知道，他就是 1926 年北伐时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写下《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著名檄文的郭沫若。郭沫若是在参加南昌起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的祖籍是宁化，隶属汀州。郭沫若那和蔼可亲的神态，热情幽默而富有战斗性的语言，吸引了傅连璋和无数颗热望革命的心。

继郭沫若演讲的是另一位戴眼镜者，他身材瘦小，精神却非常饱满，穿一身朴素的蓝布制服，颈项上系条鲜艳的红领巾，说起话来声音响亮，充满感情：“我们这支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是工农自己的军队，是为劳苦大众服务的。我们要打到广东去，建设根据地，实现土地革命……”他那铿锵的话语，加上有力的手势，使听众的情绪不由得被他紧紧抓住，和他一同悲愤，一同激昂。平时不易激动的傅连璋，也深深地被他的革命激情所感染。后来他得知这位就是恽代英。

这场报告会使得傅连璋受益匪浅。回来后他一宣讲，医院上下也极受鼓舞，医护人员以更饱满的激情投入到抢救伤员的没有确

烟的战斗中。

在这批伤员中，有中共传奇式的将领、后来享有“战将之鹰”美誉的陈赓大将。当时陈赓是起义军的一位营长，在会昌战斗中负了重伤，左腿两处中弹，膝盖处的筋被打断了，且胫骨骨折。陈赓被安排住在福音医院附近的新安楼。当傅连璋给他治疗并检查伤势时，不禁大吃一惊：陈赓脸色焦黄，伤腿肿得很粗，且红而发亮，由于失血过多，身体非常虚弱。经常与缺胳膊断腿的伤者打交道的傅连璋，揭开陈赓的被单时，心也止不住颤动。

傅连璋小心翼翼地给陈赓进行检查和治疗。他知道，每触动一下伤腿，都会给伤者带来难以忍受的剧痛。但陈赓总是对傅连璋说：“不要紧，你尽管治，我能忍受得了。”

治疗时，陈赓不仅不叫一声痛，还满有兴致地和护理他的谭惠英说话，病房里总是充满他那爽朗的笑声。

陈赓那乐观的情绪，坚定的笑容，风趣的语言，使傅连璋极为钦佩。只有抛弃小家，为了劳苦大众利益的共产党人，这些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才能有这种精神境界。这也是傅连璋行医十几年来所仅见。像这样一个年轻、勇敢、有才干的革命军官，他一生可以为劳苦大众做多少事啊，一条腿对他来说又是多么重要。傅连璋看着陈赓那年轻而坚定执著的面孔，心想：我一定要把这条腿治好！

按照常规，像陈赓这样的情况，要保住生命只有截肢一条路可走，没有其他选择余地。但陈赓的勇气使傅连璋极为钦佩，促使他下了决心，果断地为陈赓制定了“保守疗法”的治疗方案。

傅连璋细心地为陈赓接上断骨，认真清理周围已经感染坏死的腐肉，敷上药物。然后每天用“由素”（一种药名）替伤口消毒，用夹板固定。在这些治疗过程中，陈赓积极配合，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疼痛，与伤病作斗争。

当时磺胺药、抗生素都尚未问世。傅连璋一方面为陈赓的伤处仔细清创与勤换消毒敷料，一方面把自己定购的鲜牛奶让给陈赓喝，以提高他的身体机能。

从护理员口中，陈赓得知傅连璋曾经得过肺结核病，卧病两年后虽已大体好了，但身体一直很弱，所以他也很需要营养。陈赓坚持不肯接受这份珍贵的馈赠。但傅连璋真挚地说：“你现在的情况比我更需要营养，我的病已经就是这个样子，少喝几次牛奶关系不大。”

为了保住陈赓的腿，傅连璋真是绞尽了脑汁，想尽了各种办法。在他持久而慎重的医疗护理之下，陈赓的腿终于保下来了，能下地行走了。那一天，陈赓、傅连璋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由于这样一段奇特的经历，两人结下了生死之谊。后来陈赓得知傅连璋到瑞金参加了革命时，异常高兴，他从傅连璋对起义军的同情和对伤员的精心救治，知道迟早都会有这么一天。1952年，陈赓在他的回忆文章《从南昌到汕头》中，还专门谈到了这段经历，充满感情地写道：“……他（指傅连璋）是我所遇到的第一位同情我们的医生。承他尽心照护，我的腿终于保住了，我直到现在都很感激他。”陈赓庆幸自己能遇上傅连璋这样既有民族正义感和同情心又有精湛医术的好医生。他一直记住中秋节这一天是傅连璋的生日，后来每逢月圆中秋时，他都要亲自登门祝贺。即使不在本地，他也不忘致电或写信祝贺。1961年，陈赓病重垂危之时，仍不忘中秋之事，叮嘱家人说：“每年中秋节，不要忘了向傅连璋同志祝寿啊！”

在南昌起义部队伤员中，另一位让傅连璋好生敬佩的是徐特立。

时任师政治部主任的徐特立年已过半百，而且身患重病，对革命前途却满怀了必胜的信心。从他那里，傅连璋了解到了全国

各地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知道了周恩来和毛泽东等革命阵营中了不起的人物，对他们充满了钦仰之情。得知起义军领导人周恩来到了长汀，傅连璋渴望相见的心情立时强烈起来。

在徐特立的安排下，几天后，周恩来看傅连璋来了。傅连璋做梦也没想到，大名鼎鼎的周恩来竟然如此年轻英俊。联想到陈赓，联想到徐特立，他从内心感叹，共产党人真是了不得。

周恩来亲切地向傅连璋表示了热忱的谢意，傅连璋连忙道：“同情起义军，为你们行医治病，这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不论谁有病，我都会看的。”

周恩来沉吟片刻后，语气温和地说：“人道主义精神，恐怕有两种吧？”

迎着周恩来那明澈的目光，傅连璋感觉他那双闪着智慧光芒的大眼睛似乎能看到人的心灵深处，他静静地听周恩来说下去。

“傅医生，你想过没有，假定一个医生治好了刽子手，医好了强盗，那是什么样的后果呢？”

这话，就像一块石头扔进了汀江，在傅连璋心头掀起了层层浪花。这可是自己从未没有思考过的问题，他睁大眼睛悉心听周恩来讲人道主义。

“傅医生，人道主义也要为革命啊！”周恩来语气深沉地说，“给敌人以人道主义，就是对自己同胞的残忍……”

周恩来那精深的革命道理，继邓子恢之后又一次敲开了傅连璋心灵的窗扉。

在谈话中，傅连璋主动谈及了基督教问题。周恩来诚恳地说：“宗教信仰，个人有自由。我们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但不能强迫所有的人都不信神。觉悟要慢慢来嘛……”

末了，周恩来又添上一句，“傅院长，你是一个关心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人，虽然英国人对你的帮助、上帝的教义限制了你的

思想，但我相信你会追随真理，走出狭小天地的！”

咀嚼着周恩来意味深长的话，傅连璋一个晚上难以入眠。周恩来年纪轻轻就领导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徐特立年纪大却不服老，表示要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陈赓为革命险些丢了腿丧了命，秉信的却还是“虽九死其犹未悔”的革命精神……看来共产党人真是些了不起的人啊，我能和他们走上同一条道路吗？他开始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

在傅连璋的努力和照护下，南昌起义部队的第一批伤员，有的很快就随部队南下，那些伤势较重的则留在福音医院继续治疗。傅连璋为起义部队无偿治疗，使他的开销大增，经济处于拮据状态，为了维持伤病员的生活，傅连璋再次出面向当地商人募捐，想尽各种办法保护伤病员。

不久后，这批伤员也陆续出院归队，重返战场。陈赓带着还没有痊愈的伤腿，徐特立带着刚刚退烧的身体，都走了。可是他们救国为民的信念，乐观坚定的笑容，明朗有力的话语，在傅连璋心中留下了永难忘怀的印象。

正因为傅连璋在医治南昌起义军受伤将士中作出过突出贡献，所以，在以后中央对傅连璋的悼词中，明明白白地写着：傅连璋参加革命的时间是 1927 年。

巧周旋，匪首成为保护伞

面对蒋介石叛变国民革命、疯狂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恶行，中国共产党继南昌起义后，发动了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一次又一次地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声。随着中共“八七”会议精神的传达，闽西共产党人郭滴人、邓子恢、张鼎丞等积极贯彻中央进行武装起义的指示，发动农民群众，组织

力量，在 1928 年先后领导发动了后田、蛟洋、金砂等地的农民暴动，震动全省。一时间，暴动的烽火在闽西大地熊熊燃烧起来。

这些消息传到汀州，使傅连璋心里有了种莫名的躁动。

当时，中共汀州特别支部已有较大的发展。各地的暴动消息传来，特支也跃跃欲试，准备训练人员，为暴动作好准备。为此，特支决定在汀州开办“训政人员养成所”，加紧培养各种人员。但不久上杭等地也发生了国民党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五七”事变，闽西的态势一时又严峻起来。面对如此局面，特支的活动必须谨慎。当时驻防汀州的是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为了使“养成所”披上合法的外衣，必须取得郭凤鸣的同意。这就需要与他拉上较为紧密的关系。

郭凤鸣原来是闽西封建帮会“关爷会”的门徒，早年与其兄纠集一帮人，专干打家劫舍、偷鸡摸狗的事，是个十足的盗匪。后来被北洋军阀招抚，北伐后伪装革命，投机钻营，混了个旅长，坐镇汀州，统治闽西各县，成为地地道道的土皇帝。当初南昌起义军入闽，为得到各方面的支援，减少敌人的攻击，对外一律称是北伐军之一部分，郭凤鸣也就表示欢迎；当他知道这是共产党的部队后，吓得七魂出窍，应酬一下连忙躲到乡下“养病”去了。起义军看他表面上还老实，没有动兵放枪，也就暂且放过了他。起义军一走，他又神气活现起来了，叫嚷道：“起义军不过是过路的小鬼，天下还是咱们的！”

自从积极为南昌起义部队治伤后，傅连璋就与汀州地下党组织增多了联系。党组织考虑到傅连璋与郭凤鸣有些交往，就将拉关系这个任务交给了他。

中共长汀特支这么相信一位信奉基督的院长，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这除了傅连璋出身于穷人家庭，给起义军治过病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在穿针引线。

这个人就是傅连璋的侄女傅维玉。她是共产党员，在南昌葆灵中学读书时参加革命，后来参加了南昌起义。她跟随南昌起义部队回到汀州后，以教英文为掩护，秘密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成为汀州地下党的重要成员之一。党组织正是通过她，了解了傅连璋的真实心理活动，所以才敢冒险把重任相托。

傅连璋毕竟是当时远近闻名的医生，他对病人是来者不拒，虽然心中对旧社会也感到彷徨，对起义军也同情并热情救助，但对于郭凤鸣这个土霸王也不敢得罪，并且在医治方面也是尽心尽力，所以他成为两边都可以做工作的人物。正是在替郭凤鸣本人及家属治病，替他的部队疗伤的过程中，郭凤鸣看傅连璋有用得着的地方，所以对他也是另眼相看，想拉傅连璋为自己服务。他得知傅连璋这次给起义军治过病，不免声色俱厉地训斥一番，说什么“上帝的臣民竟然给共产党看病，上当受骗了”，尔后又笼络说：“只要你今后不要再上当 你在我的手下尽管做你的汀州名医。”郭凤鸣对傅连璋表现出一种自认为的“哥们义气”，而且做出这种姿态让人看，也好让人知道自己的知人善用，为自己挣足面子。

傅连璋正好利用这一点，把郭凤鸣当成了自己的“保护伞”。他接受中共长汀特支的任务后，利用替郭凤鸣看病的机会，进行了艰难的说服工作。

“旅座，最近附近各县都不太安宁，还是早作准备的好。”傅连璋没有直接切入正题。他知道郭凤鸣天性多疑，绝不能单刀直入，而要迂回侧击，才能达到目的。

“是啊 我正为此而苦思良策呢。依你之见 如何是好呢？”问题点到郭凤鸣的痛处，不能不使他重视。在万般无奈之际，竟然问起傅连璋这位医生来了。

“要成大事者，惟在善用人才。当今之际，人才难求是最大的难题，不知旅座以为然否？”傅连璋故意套郭凤鸣的话。

“是啊，人到用时方恨少呀。”郭凤鸣摸了摸自己的光头脑袋，显得无可奈何。

“不，人是不少的，但好用的、真正为你所用的不多。”傅连璋慢悠悠地道。

“你这话正说到我心里了。看来傅医生也不简单啊，不知你有什么高招？”郭凤鸣有所警觉。

“见笑了，我只是瞎猜而已。有一点不成熟的想法，不知当说不当说。”傅连璋小心地问。

“你尽管说来听听。”郭凤鸣确实想听。

“能不能自己训练一些人员，这不是可以为己所用了吗。”

“这个办法倒是值得考虑。让我好好想一想。”听傅连璋这么一说，郭凤鸣有所心动。

傅连璋知道不能急，也就闭口不说了。

过了一段时间，傅连璋又去找郭凤鸣，装作不经意地又转到了这个事情上：“不知旅座意下如何？”

“这个办法好是好，但哪里去找那么现成的人员帮助办呢？”看来郭凤鸣有些动摇，显然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

必须再加一把火，傅连璋想。“这好办。本汀州不是有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吗？只要把这些人抓住，就不会出问题，可以为旅座所用。蒋委员长办黄埔军校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郭凤鸣听傅连璋把自己与蒋介石相提并论，不免显得踌躇满志，摸摸光头，随即一拍大腿，瓮声道：“好，那就办吧。我叫人马上办理。”

于是，郭凤鸣指令商会出钱，选定在汀城王衙前刘家祠开办“养成所”。

1928年11月，“训政人员养成所”正式开办。它向长汀、连城、上杭、宁化、清流、归化（今明溪）等县招收了具有一定文

化程度的进步青年农民 60 余人。特支派段奋夫、王仰颜、黄亚光、黄继烈等共产党员进入“养成所”工作，王仰颜任训育主任，黄继烈任事务主任，段奋夫、黄亚光等任教员。他们向学员们宣讲土地革命的政策主张，宣讲组织农会、武装暴动、建立工农政权等革命道理。

“训政人员养成所”连续办了两期，共培训了农民运动骨干百余人。郭凤鸣做梦也没有想到，共产党人利用他的关系，挂着老牌子，却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培养共产党的干部。

后来，党组织见目的已经基本达到，且考虑到这些人员的安全问题，便以经费不足为由，提前解散了“养成所”。内中奥秘，郭凤鸣却还一直蒙在鼓里。

一天，郭凤鸣又住进了傅连璋的福音医院养病，道：“傅医师，你这个汀州名医要赶快把我的病治好，服侍好了，本旅长不会亏待你的。”

“当然，我一定尽力。”傅连璋在人家的地盘，不能不虚与委蛇。

在傅连璋的精心护理下，郭凤鸣病体很快好转。他又显出了江湖本性，满心高兴地说：“傅老弟，果然医术高明，妙手回春。好，你有恩我有义，你有啥需要的，尽管找我好了。”

“我是行医之人，没有什么奢望，只求平安罢了。”傅连璋推托说。

“实话给你说了吧，你想平安还不容易呢，灾祸这东西，你不找它它会找你。你人太老实，上回就上过共产党的当……”郭凤鸣旧话重提。

傅连璋听出郭凤鸣话中有话，忙说：“旅座，我是个基督教徒，又是个医生，只求救死扶伤，与什么政党素少瓜葛，也没有什么私仇，不会这么严重吧？”